



# 自我行动的逻辑

## 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

The Logic of Self-acti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ket Practices



NLIC2970946165

汪和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大学园区图书

# 自我行动的逻辑

## 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

The Logic of Self-acti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ket Practices



NLIC2970946165

汪和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行动的逻辑: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汪和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 - 7 - 301 - 23284 - 2

I. ①自… II. ①汪… III. ①市场经济 - 经济社会学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F1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3190 号

书 名:自我行动的逻辑——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

著作责任者:汪和建 著

责任编辑:胡利国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301 - 23284 - 2/C · 094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mm × 1300mm 16 开本 23.75 印张 331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 序言

本书是我完稿于2006年的博士论文。这项研究花了我数年时间，并且已取得了某些成果，然而，在出版本书的问题上，我却长时间陷入困惑。部分是因为我的不可救药的“比慢精神”<sup>①</sup>，即期望多用一些时间来磨砺本书的理论；但更主要的是因为2007年爆发了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大有成为表述任何一起社会事件的共同背景，这种情形让我心生疑虑：本书是否“不合时宜”？

直到最近，我才从这种困惑中走出来。我决定出版本书，并且决意要在此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重审本书的研究定位和意义。同时，我也希望能由此厘清目前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所给中国研究带来的某些困扰。

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研究带来的困扰，主要在于它以阶段性呈现的不同事实激发了人们对有关“中国经验”的多种，甚至对立的理解。危机前，中国二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已在中外学者中触发了各种旨在理解或挖掘“中国经验”的学术研究。本书研究可谓其组成部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将有关“中国经验”论题推至世界新闻和舆论中心的却是那些提出了更具吸引力的“中国模式”的非严格学术研究者，其中，最具影响的是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他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将中国的新的发展称为“北京共识”：

---

<sup>①</sup> 林毓生先生（1988：5）倡导的一种治学态度：“比慢不是比懒，是在心情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用适合自己的速度，走自己所要走的路。”我在1999年的那本书里就曾提及受此精神之鼓舞，并且固执坚守至今，尽管因此付出了“代价”。

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雷默,2004)

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正在“取代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它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但现在却被宣布为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雷默这一宣言,很快吸引了中外众多有关“中国模式”的追随者和评论者。

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度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兴趣。金融危机呈现出了这样一幅图景:当世人都在为经济前景担忧时,北京却通过举办空前辉煌的奥运会显示了中国无比的信心;在各国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时,中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例如,2009年GDP增长率超过8%,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西方社会频发社会保护运动(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时,中国社会仍然保持其和谐稳定。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图景,让许多人相信,倚重国家和半市场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比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更加成功。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倾向的中国学者或评论者因此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他们表述独特的“中国模式”的存在,并且论证其作为一种超越“西方模式”的新的典范的可能性。张维为便是其中的代表。在他看来:

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张维为,2010:59)

“超越西方模式”“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类说辞对于许多

国人而言的确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它极能满足近代以来既深植于国人心中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然而,2009年前后,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各类“中国模式”论逐渐失去说服力。人们发现,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依赖出口和国家投资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非但不能“独善其身”,反而更可能遭受外部危机的影响:当金融危机导致外部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时,中国的外贸出口也随之大幅萎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政府不断加大投资,结果却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同时,政府为培育国内消费市场而有意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多种努力也遇到了各种阻力,例如,实施《新劳动合同法》受阻于外部金融与经济危机所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困局,而有关调整收入分配的改革则数次遭受来自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终告失败。

由此,另一种观点即反“中国模式”论便趁势而起。这一派人有着鲜明的自由主义的立场,其观点也颇为统一:世界上只有普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没有特殊的“中国模式”。在他们看来,即使中国过去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也只能证明那是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初建了符合市场经济的某些体制和原则的结果。

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并没有任何独特之处。经济上,自由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将带来国家的繁荣;政治上,“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加强对官员的问责、加强对民生问题的关心,将促进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增强公民的言论自由、自下而上逐步扩大民主选举,也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可以看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如果要成功,必须和西方的体制接轨。(黄亚生,2011:3)

他们反对“中国模式”论,除了质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特性以及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其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黄亚生与张维迎等人所担忧的是,如果‘中国模式’被认定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们就可能否认有一种符合普世价值观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中国将因此拒绝更深

层面的改革,而那显然是危险的。”(吴晓波,2011)

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不过,在此我同样担心的是,当下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已经或者正在蜕变为左右派之间火药味甚浓的意识形态之争。倘若陷入类似“诸神之间无穷尽的斗争”,那么,其危害则正如韦伯([1919]1998:45)所告诫的,它既“不会有结论”,也无助于各方真正“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所以,我的态度是:有必要将争论重新拉回到以“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为中心的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来。

从学术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模式”论与反“中国模式”论各有其正确与偏颇之处。“中国模式”论虽然肯定中国形成独特的发展路径与模式的可能性,但是,其浓厚的价值判断取向却在事实上阻塞了其通往客观揭示中国转型时期本土性因素(如政治文化传统)与普适性因素(如市场经济)之间的关联的学术之路。相反,反“中国模式”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大趋势,但却否定了政治文化传统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除了不断重申其价值立场外,其并不能推进理解中国转型与发展之路。可见,两者都没能做到从抽象的价值判断的“云端”下降到现实的中国社会进行具体的观察与思考。

可贵的是,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对此进行反思,并由此提出对有关中国经济奇迹之谜的解答。例如,张五常(2009)提出了合约分成制县际竞争模型。他将1989年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视为一种承包(租税)合约分成制;该合约安排不仅使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发展经济的动力,而且也导致县际之间在发展经济上进行激烈的竞争。他认为,这正是“中国做对了的事情”,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奥秘所在。虽然争议极大,而且近年来县际竞争所产生的负效应日益显现,但不可否认,他的研究聚焦于现实,并且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基于政经合约安排的“路径依赖发展”。

与其不同,茅于軾和苏东(2012)提出了勤劳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论题。他们认为,“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好,是很难成立的。”在经济制度

并不足够好的情况下,中国仍然能够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经济奇迹,是因为中国人身上存在着类似韦伯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

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人最勤奋和节俭,最具有吃苦精神,最听话和守纪律。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还最渴望获得财富——实际上,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这样,很多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发财发财!”……另外,中国人还有喜欢变通,不太讲究规则的特点,当然,这一特点并不全是优点,正如很多人所说,还是很大缺点,但这恰恰使中国人总是能够在重重管制制度的缝隙,找到一条可以变通的道路,使得中国人可以绕过许多的管制束缚,即所谓的“绿灯亮了赶快走,黄灯亮了抢着走,红灯亮了绕着走”。也就是说,正是有了这条特质,使得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制度上的缺点。

这一解释虽然有些简单(如止于“民族性”描述而未能探究其文化根源及其影响经济的过程),但却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能够走出抽象的价值判断而尝试观察和分析具体的和具有特殊历史文化的中国现实。此外,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从某种或某些具有不确定性的政治—经济制度出发,而是从观察和概括更具稳定性的中国人的行为特性出发去揭示中国何以能够创造出巨大经济奇迹的特殊原因或力量。这一研究取向与本书的立场颇为接近,尽管本书并非直接探究中国经济奇迹问题。

本书的正副标题已经说明了它的要旨:它力图从社会体系的角度,通过构建一种社会行动理论即本书所述的自我行动的逻辑的理论,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市场实践的特性及其内在关联,从而揭示决定或影响中国经济之竞争优势及其限制的某些更为根本的社会力量。这一定位部分是由于我的经济社会学的学科专业化操作,它要求将研究重心放在社会体系(包括“社会市场”)上;部分是由于我对转型期中国市场体系及其变动方向的判断,即认为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着两类市场即“政



治市场”与“社会市场”，并且“社会市场”的发展即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转型的方向。<sup>①</sup>

诚然，“政治市场”及其变动可以显示政治或政府权力对经济生活包括市场转型的影响，因而，它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域。然而，回顾“市场转型”及其争论（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研究（或广义称“社会主义国家”研究）之传统模式“国家中心论”就已为关注“社会体系及经济行动者”的“社会—行动”模式所取代。更何况，“社会市场”能够更为典型地反映中国人参与市场实践的特性，因而也最易通过观察和分析中国人所特有的行动逻辑，理解其市场实践的特性及其内在关联，从而最终达到既解释中国何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经济绩效，同时又指出其面临着哪些内在的限制的目的。当然，本书还有一个“野心”，即希望通过此项研究提出一种基于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即自我行动逻辑的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以期推动当代市场社会学之进一步修正或再转向。

本书研究的策略和路径是：首先（第一章）从有关“中国经验”的一般经验事实中，归纳出了中国人市场实践的三大特性，即自主经营、网络生产和派系竞争，然后提出其总体性问题：中国人何以偏爱自主经营？假如说中国人崇尚个人自治，为何他又可能利用其亲友关系来创办企业？甚至能够进一步利用其关系来建立一种作为分工协作体系的网络生产？再则，既然中国人能够在其生产网络中开展互惠交易，为何又不能在一个更大的生产市场（产业区）范围内开展合作，而是倾向于采用那种注定会陷入“囚徒困境”的派系竞争？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无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何以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还是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某些致命的限制，都至关重要。我的判断是，中国人市场实践的三大特性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只

---

<sup>①</sup> 我在本书（第50页）写道：“随着宏观市场体制的进一步的改革，社会市场的范围在不断扩展，而政治市场的规模则在逐步缩小。”时隔六年，我不得不承认其多少低估了改革的复杂性，不过，我并没有对这一判断失去信心，我依然相信它会在未来“长时段”里得以逐步实现。

有揭示其内在关联,才能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

怎样才能揭示其内在关联呢?我回顾了三种既有的市场理论,即市场的自然主义理论、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和市场的新制度主义理论。通过比较分析,我认为,这三种理论都有各自不同的局限,都不足以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因此,必须再建一种新的市场的社会学理论,即所谓“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要建构这一理论,不单是要转变有关当代市场社会学研究的视域,即从市场的“社会结构”或“规则”转变为“市场实践”,而且更关键的是要重建一种通向理解市场实践的方法,即从社会行动出发理解作为特殊的经济行动的市场实践。为此,我提出了能够建立这一方法的基本假设:中国人的市场实践是建基于中国人的自我行动的逻辑基础之上的。自我行动的逻辑构成了中国人市场实践的内在逻辑。显然,无论是理解中国人市场实践的内在逻辑,还是以此为基础建立“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都必须对中国人的自我行动的逻辑予以建构和解释。

为此,在第二章中,我建构了一个作为中国人的行动逻辑的理论模型,即自我行动的逻辑的理论框架。“自我行动的逻辑”乃是一种从自我行动到关系行动,再到小集团或派系行动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之驱力根源于中国人所特有的“自我行动”。自我行动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的“个人行动”。虽然自我行动有着与个人行动类似的自主性和经济理性,但是,自我行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受关系理性约束的自我主义的行动。“自我主义”和“关系理性”实为儒家文化之建构。不过,其功效有所不同:自我主义会受自我内在之经济理性的驱动,它将引导着自我以建构和利用其关系网络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经济与社会目的。而关系理性则试图建立一种差等性对待他人的理念,从而限定自我主义或工具性运作关系的范围。关系理性和自我主义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它们共同决定着中国人的自我行动及其向关系行动和小集团或派系行动转变的逻辑进程。

由此,我逻辑证实了前面提出的假设:自我行动的逻辑构成了中国人基本的行动逻辑。正是由内含于该基本行动逻辑的某些稳定的因素

或力量在根本上支配和引导着中国人的市场实践的逻辑。根据这一假定,我提出了一个结构对应地理解或解释中国人市场实践逻辑的研究纲领,即沿着自我行动的逻辑轨迹,探讨市场实践之逻辑进程,从而理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的特性及其内在关联。

这样,从第三章到第五章,我便依据这一研究纲领,对涉及中国人市场实践的三大特性及其内在逻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观察和分析。在这一分析中,我运用了不同来源的经验材料,其中,主要有根据2004年初我所组织的有关中国居民市场实践的问卷调查而作的统计资料(问卷内容详见附录A)以及通过对同年开展的江苏省吴江市横扇(镇)羊毛衫产业区之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所取得的记录资料。

第三章解释的是,中国人何以将自主经营当作其参与市场实践的首选方式?通过将自主经营当作一种自我行动来进行观察与分析,我提出并论证了第一个理论假设或命题,即自我行动是影响和决定中国人选择自主经营这一市场实践方式的根本力量。其中,源于自我主义的自治感是引导中国人偏爱以自主经营的方式参与市场实践的主观力量;而来自关系理性的亲友关系运作则是决定个体能否获取社会资源,从而决定其能否实现自主经营的客观力量。这一假设给出了有关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两个显著特征即其增长迅速但规模偏小的恰当解释。

第四章解释的问题是,崇尚个人自治的中国企业家们何以能够组合起来共同建立并维持一种作为分工协作体系的网络生产?通过将网络生产当作一种特殊的关系行动即关系交易来进行观察和分析,我提出了第二个理论假设或命题:内生于自我行动的关系交易的两个特性,即工具化他人和差等性给予,是决定和影响生产网络建构及其运行的根本力量。通过对横扇羊毛衫产业区中的关键性个案“Y生产网络”的观察和分析,我论证了这两个特性是分别通过构造工具性互惠交易和义务性互惠交易实现生产网络的建构的。之后,我解释了这两个特性对于维持生产网络及其运作的不同的影响:差等性给予能够透过义务性互惠交易,构造一种上下间庇护依赖的关系网络。正是这一关系网络维持着生产网络的团结与运作。相反,工具化他人则可能诱发策略

性的(包括机会主义的)权力运作,从而造成上下间支配与自治的斗争,由此可能造成生产网络的变异或衰败。

第五章我要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区域内(或产业区内)发生过度竞争现象?在将(生产)网络间竞争当作一种小集团或派系行动来进行观察和分析后,我提出了第三个理论假设或命题:关系认同作为派系行动的指针或基本取向,是引导和决定网络间竞争及其联盟的根本力量。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人的关系认同,我发现,不同类型的关系认同——尽管其拥有共同的基本特性(指向他人和关系操作)及其作用(如工具性和可伸缩性)——所带来的效应是不一样的。横扇经验表明,亲缘认同虽然有助于人们建立和巩固以亲属和拟似亲属关系为纽带的生产网络,但是,其造就的网络或企业间既分立又联系的关系格局,以及由此引致的既模仿又封锁的竞争策略,却又导致了网络间的过度竞争。地缘认同——作为一种扩展的关系认同——能够被策略性地运用于控制区域内的过度竞争,即在地缘认同的基础上,藉助地方政府之支持开展区域结社。区域结社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其通过一些组织化的行动创造出了一种作为普遍框架的网络间联盟,从而起到了某种抑制区域内过度竞争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在其组织内部形成了一个作为小集团或派系的网络间联盟。该联盟之封闭性及其对其他组织和非组织成员的区隔和排斥,造成了作为区域内普遍框架的网络间联盟的分裂,从而其最终不是抑制而是诱致区域内外的更大范围或规模的过度竞争。

由派系竞争所导致的过度竞争,因而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内在限制。不过,本书引述的温州经验可以表明,中国企业家能够在一种新的或再扩展的关系认同,即非超越性业缘认同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种作为变通的或折衷主义的网络间联盟即所谓“联邦型网络间联盟”,以应对区域内外所存在的过度竞争现象。

本书最后(第六章),我对本项研究所获得的总体性认识或意义进行了概述。我相信,本项研究对于三个方面的认识会有影响。第一方面涉及的是对中国人市场实践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意义的认识。本书的

理论将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人之在地实践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它也将支持一种温和而积极的“全球在地实践”观,即真实的全球化是西方规则的全球扩散与非西方文明中的各种在地实践的相互交融的过程。

第二方面涉及有关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及其在市场实践中的运用的理解。本书的研究势必引向这样一个结论,即自我行动的逻辑构成了中国人市场实践的内在逻辑。这将使我们认识到,决定“中国经验”的是中国人的市场实践,而引导中国人市场实践之特征的根本力量来自于其自我行动的逻辑。自我行动的逻辑正是我们所要探寻的一种内蕴于中国人市场实践且决定着其运作逻辑或规律的稳定的社会力量。

第三方面是关于本书的探讨是否引致当代市场社会学研究的转向问题。我认为,本书通过对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的特性及其内在逻辑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基于自我行动的逻辑的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这套理论完全不同于正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不等同于两种当代市场社会学理论即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和市场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甚至也与作为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可能的变体即所谓市场的社会建构理论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会促使当代市场社会学研究的再转向,即从市场的社会建构分析进一步转变为市场的社会实践分析。

最后,作为附论,我说明了本书提出的理论即自我行动的逻辑的理论所可能具有的某些扩展性的意义。

为使读者对这一附论有更具体的认识,我将最早提出自我行动的逻辑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单位制组织问题研究的一篇论文,即《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汪和建,2006)附录于本书(详见附录B)。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中国人自我行动的逻辑,可能成为解释中国其他经验问题的一种较为普适的行动理论”。从思想脉络上说,本书可谓我之后力图对该理论进行修正并将其运用于理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的结晶。

应用范围或许是检验一个理论好坏的重要标准。不过,我想说的是:经验科学理论大多是为理解一些特定的经验问题而建构的。尽管

它包含了某些超出特殊事实的一般性意义,但是,如果这一理论不能与更多的新的经验问题“匹配”结合,并且在与那些经验事实的互动中得以修正,那么,它终将会成为一种僵化的理论。因此,我关切的是“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论的发展,而不是通过某些毫无创造性的所谓应用和验证,证明其作为一种独特的和自成体系的理论。只有把这一理论与正在发生的经验问题与事实——当下最具挑战的经验问题或许莫过于“政治市场”的扩张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收缩——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探讨如何发展这个理论以及怎样依据它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的发展策略。

在付梓之前,我最想表达的还是对所有给予我教益和帮助的人致以衷心感谢。从大学起,我最大的荣幸是一直得到葛林教授的教诲。他对我关于人生与学术的理解有着深刻的影响。谨以此书怀念已逝恩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得到的最难以估量也是最重要的,是我的导师童星教授的教益。他始终关心我的学习与工作。他的关怀和指点给予我这项研究以极大支持和鼓励。他告诫我,所有的理论都有其特殊的背景与效用,后人必须谨慎并虚心对待之。我愿将这一精神倾注于我毕生的学术志业之中。

有几位老师兼同事和朋友对本书助益良多,他们是周晓虹教授、吴作富博士和冯小双编审。2003年我修读了周晓虹教授主讲的《当代中国研究》博士生课程。我的《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一文正是研读该课程的结果。倘若没有周老师、吴老师对此文的评论与建议,以及冯老师在阅读了该文修改稿后所给予的不吝评价,真不知我是否有如此勇气将该文提出的理论扩展应用于本书的研究。

我的同事和朋友陈友华教授在问卷设计与数据处理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我的挚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张小山教授也在问卷调查方面给予了我宝贵的帮助。此外,来自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大学以及华东理工大学的约120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了问卷调

查工作,他们对保证本项研究的质量标准贡献良多,但却难以一一具名致谢。在实地调查和资料整理等方面,我的学生秦文佳、汤永、盛宏寿、刘文洁、王东要、汪秉权和孙薇给予了很大帮助。当然,我要特别感谢秦文佳和她的爱人吴晓锋博士。没有晓锋的协助以及其家人的热情接待,本书有关横扇—濮院的实地调查是断然无法做到的。

除此之外,我的研究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资助,以及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和东吴大学社会学系邀请的学术交流——我敬致衷心的感谢。

本书各章节的部分内容曾以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形式分别发表在《社会》2005年第5期(第一章);《中国研究》2007年春秋季合卷总第5—6期(第二章);《社会》2007年第6期(第三章);《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2期和《社会理论论丛》2009年第5辑(第四章);《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2期和《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五章);以及《社会》2009年第5期(第六章)。对于出版者允准我运用这些材料以完整出版本书之美意,我在此谨致谢忱。对使我有幸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的周丽锦女士以及为本书付出了极大心血的胡利国编辑,我在此一并致谢。

若无爱妻金雁和女儿汪舒的支持,本书是无法完成的。我要对她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家乡不断勉励我使这项研究达到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准。不幸的是,在我即将完成本书时,病魔夺走了父亲的生命。因此,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最敬爱的父亲,以寄托我对他的感激与思念。相信父亲天堂有知也会为之欣慰和快乐。

汪和建

2012年10月22日于南京

#### 参考文献

黄亚生,2011,《“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北京:中信出版社。

- 雷默,2004,《北京共识》,新华社《参考资料》编辑部译,<http://time.dufe.edu.cn/wencong/washingtonconsensus/beijingconsensus.pdf> 2012-10-16。
- 林毓生,1988,《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
- 茅于軾、苏东,2012,《勤劳是中国奇迹的根基》,<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151?page=2> 2012-08-23。
- 汪和建,2006,《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制组织的社会建构》,载《社会》第3期,第24—45页。
- 韦伯,[1919] 1998,《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
- 吴晓波,2011,《“中国模式”独特吗?》<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810> 2012-10-16。
- 张维为,2010,《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五常,2009,《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



# 目 录

序言/1

第一章 导论:理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1

一、问题与假设/1

二、三种市场理论:批判性回顾/23

三、本项研究的立场、方法与结构/47

第二章 自我行动的逻辑:一个理论框架/56

一、自我行动:一个概念的提出/56

二、自我行动的逻辑:过程与后果/65

三、通往理解市场实践之路:一个研究纲领/77

第三章 自主经营:自治感与资源获得/81

一、问题与假设/81

二、自治感与自主经营偏好/83

三、亲友关系运作与资源获得/96

四、变通性策略及其后果/106

第四章 网络生产:互惠交易与权力运作/116

一、问题与假设/116

二、来自关系交易的生产网络:以 Y 生产网络为例/118

三、关系交易如何影响生产网络的运作/135

四、地方性网络生产:优势及其限度/157